

第一,在世界历史中克服西方中心论,不能单纯依靠西方学术范式的自我反思。虽然当下西方学界试图通过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化”,来解决完全依靠欧美历史经验建构世界历史模式所出现的理论偏差与种种问题,但源自欧洲历史和社会科学经验的学术范式所占据的主导地位阻碍了这种认识。^① 无论是以中国为中心理解中国历史,或是让中国历史世界化,都最终成了一种消化中国历史于西方学术范式的学术尝试。从其多种理论范式的实践来看,并不成功。只有对中国历史进行彻底的再研究,寻求超越主要基于西方经验的现有历史分析范畴,才有可能完善和发展当前世界历史模式,走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第二,仍需要继续坚持与弘扬中国学界在世界历史研究、比较历史研究中所一贯提倡的历史事实与因果逻辑相统一的唯物史观研究原则。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探索因果必然性出发,从理解国家、上层建筑的公共职能最终一定要适应其现实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公共利益与公共需要这一因果必然性出发,将欧洲“帝国—民族国家”经验与中国从王朝到现代国家的历史经验,共同容纳于一个具有因果必然性规律的世界历史模式中,才能真正地解决中西方历史概念与范式的相容问题。

第三,在具体的历史写作中,倘若暂时无法找到一种更好的范式对接中西方不同学术范式,可以先申明中外概念的差异,并保持不同历史观念的共存。这也是一种客观、务实和科学的态度。这在过去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中有过一定的实践,也体现了编著者对于中外历史发展不同特点的谨慎关注。例如在周一良、吴于廑先生的世界通史中,称亚述、波斯、贵霜、罗马等为帝国,但称呼秦汉则为“秦汉中国”。^② 又如在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中,也是如此处理。“明代中国正由盛转衰,郑和西航不但后继无人,而且也绝不能引发商业革命。印度莫卧儿帝国虽方兴未艾,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虽正处于全盛期,但从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还看不出新时代的征兆。”^③ 这种“王朝”与“帝国”概念的并用,显然是一种务实与科学的态度。

总之,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使用跨语际的概念时,史家应谨慎对待其意涵与外延历史经验中的差别,并适当辨析。因为概念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形容词式的限定,它还将干涉人们如何理解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选择何种框架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对接,故需慎重对待与思考。

英帝国史研究的“后殖民转向”*

魏孝稷 (安徽大学历史系讲师)

1883年,正值英帝国的扩张达到高潮的时刻,约翰·西利出版了经典著作《英格兰的扩张》,推动了英帝国史学的出现。^④ 显然,英帝国史学的产生是英帝国扩张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殖民主义辩护的一种意识形态,激励英国人担负起全球性帝国统治者的责任。^⑤ 但是,随着英帝国的解

^①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齐思和分卷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19页。

^③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刘祚昌、王觉非分卷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项目编号:19ZDA237)的阶段性成果。

^④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Macmillan and Co., 1883.

^⑤ Dane Kennedy, “Imperial History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24, No. 3, 1996, p. 345.

体,英帝国史学也走向了衰落,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帝国史学已经成为历史学科中最死气沉沉的研究领域。^①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帝国史学受到人类学、生态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及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从关注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转向了关注文化、认同、生态环境、性别、种族以及殖民知识,极大地拓展了帝国史的研究空间,使帝国史研究又出现了生机,这种史学思潮被总称为“新帝国史”。^②其中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可谓最大,有学者把用后殖民视角研究帝国史的取向叫作“后殖民转向”。美国学者戴恩·肯尼迪提到,所谓“后殖民转向”意味着历史学“从强调物质力量的解释(如军事对政治的影响或全球贸易体系对财富生产的制约)转向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③具体来说,后殖民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一是讨论“差异性”话语表述与帝国统治的权力关系;二是被殖民者、有色人种、工农阶级、妇女等帝国底层群体的主体性问题。

一、“差异性”话语与帝国统治的文化权力

尽管在萨义德出版《东方学》之前就有学者讨论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态的问题,^④但是,正是萨义德系统地反思了西方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与殖民统治之间的关系。在萨义德看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不仅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的权力统治被征服地区,还受到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强烈的支持和驱使”。^⑤萨义德批判的重点正是西方描述东方而形成的一门学科——“东方学”及其相关的知识。传统上,东方学家和帝国史学者认为,西方人研究东方的语言、历史、艺术、宗教和社会生活,建立了东方学这一门精深的学科,是为了西方人能够准确地认识东方,甚至是为了替东方人保存整理东方的文化。萨义德改变了人们对东方学的看法,他指出,只有把东方学当作一种话语来考察,才能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西方人通过东方学和相关的知识建构了一个想象的异域,或者说,制作了一个“东方”,借以获得自身的力量和自我身份。^⑥因此,东方主义话语“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⑦而这种权力的实现依赖东西方“差异性”的话语结构,也就是说,在东方主义的话语结构当中,存在一个本质对立的西方和东方,西方是进步的、民主的、理性的、节制的、男子气概的;东方是落后的、专制的、非理性的、纵欲的、女性气概的。东方主义话语中的“强弱”“优劣”对立关系构成了西方支配东方的话语秩序。^⑧

在萨义德那里,东方主义话语是互文性的,文学作品、新闻报道、政论、人类学、旅行记、地理学、科学知识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根基——自由主义思想在内的所有不同形式的文本相互指涉,构成了关于东方的话语体系。^⑨不过,萨义德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学作品,所以,一些文学研究者率先将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用于帝国的文学研究。而主流的帝国史学者一开始报以敌视的态度,但是,后殖民

^① Frederick Cooper,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Ania Loomba, Antoinette Burton, et al., eds.,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Beyond*,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01.

^② Stephen Howe, ed., *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 Routledge, 2010, p. 2.

^③ Dane Kennedy, “Postcolonialism and History”, in Graham Hugg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79.

^④ Bernard Cohn,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⑤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⑥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页。

^⑦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8页。

^⑧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49页。

^⑨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30—31页。

理论提供的新颖视角还是吸引了大批支持者。^① 后殖民理论与历史学的联姻迎来了新的前景。持后殖民立场的学者研究的殖民话语对象大体没有超出萨义德谈到的范围。但是,出于历史学研究的专业性和可操作性,历史学家往往从殖民话语的不同侧面进行反思,具体包括东方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术史、旅行记中的他者形象、科学和医学话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等。^② 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介绍部分代表性著作。

阿拉伯人出身的萨义德批判的东方学主要是西方人生产的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尽管他的《东方学》也涉及了印度学(Indology),但毕竟略而不详,这给一些学者反思印度学和汉学(Sinology)等其他分支学科提供了思路。1990年,罗纳德·因登出版的《想象的印度》一书就带有强烈的萨义德风格。^③ 他在书中系统分析了启蒙运动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印度学家关于印度的表述。他认为,西方的印度学家用几个本质化的概念来定义印度社会的特征,即种姓制、印度教、乡村血缘社会和专制主义王权,从而把印度想象成一个缺乏个人主义、政治自由、科学等西方特性的落后社会,且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落后本性,只有依靠英国人的统治才能获得进步。因此,欧洲的学者与殖民者以及西方的商人阶级依据这种印度学话语进行联合统治。与萨义德不同的是,因登还认为可以利用印度人自己的能动性,比如印度学者的本土研究实现对印度的准确认识。印度裔学者贾韦德·马吉德具体关注了18世纪末19世纪早期的几位印度学家,如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等学者,强调他们虽然打造了不同版本的印度形象,比如琼斯的印度形象是正面的,密尔的印度形象非常负面,但是他们生产的有关印度的知识都成为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基本教材。^④ 赴美的中国学人顾明栋写出了当今仅有的一本讨论“汉学主义”的专著《汉学主义》来反思汉学,^⑤在书中他承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理,但主张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及后殖民主义是不同的。因为,在他看来,东方主义或隐或显地为殖民统治铺路,但是在历史上西方从未征服过中国,所以,他提出,汉学主义“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认识论方法论和西方视角指导下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其潜在的逻辑是“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无意识”。^⑥ 国内学者也参与了汉学主义的争论,不过,总体上没有引起学术界太多关注。^⑦

一些后殖民史学者注意到,殖民主义时期的人类学和东方学的作用是一样的,目的是直接为殖民统治服务。人类学学科的特点是利用文化、部落、族群、宗教等概念把一个个复杂的整体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单位,因此,对于殖民者来说,人类学的话语有利于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尼古拉斯·德克斯就指出,英国人提出的印度“种姓制度”一方面是为了缔造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通过扭曲和简化印度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分裂印度社会以有利于殖民统治。^⑧ 贾南德拉·潘迪认为,印度社会中的教派主义和宗教冲突是英国殖民者建构并加以制度化的

① Dane Kennedy, "The Imperial History War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54, No. 1, 2015, p. 9.

② 除了这些严肃的知识以外,广告宣传之类的话语也可以是后殖民史学研究的对象。参见 Anne McClintock,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Routledge, 1995.

③ Ronald B. Inden, *Imagining Ind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④ Javed Majeed, *Un governed Imaginings: James Mill's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and Orien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⑤ Ming Dong Gu,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Routledge, 2013. 中文版参见顾明栋《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⑥ 顾明栋:《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第20—21页。

⑦ 顾明栋、周宪主编《“汉学主义”争论集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顾明栋:《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第19页。

⑧ Dirks Nicholas, "Castes of Mind", *Representations*, No. 37, 1992, pp. 56—78.

产物。^① 非洲史学者发现非洲殖民地也存在类似的经历,勒罗伊·韦尔等学者发现非洲的部落认同在前殖民时期并不稳定,殖民统治使部落认同强化,这为后来非洲一系列的部落冲突埋下祸根。^②

进入 19 世纪后,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成为建构殖民话语的主导性力量。他们建构了一套“文明使命”(civilizational mission 或 civilizing mission)话语,长期构成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在著名的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看来,“如果从殖民主义中减去‘文明使命’,殖民主义就根本不存在了”。^③ 乌代·辛格·梅塔论述了自由主义与帝国统治的共谋关系。他在《自由主义和帝国》一书中考察了与英印殖民当局有直接关联的几位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詹姆斯·密尔、托马斯·马考莱和约翰·密尔关于帝国统治的主张,发现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将西方和非西方放在一个“自由”的宏大叙事当中,宣称未进化到“文明”阶段或尚处在“儿童”状态的殖民地人民应该像孩子依赖父母一样受到高级文明的监管。^④ 梅塔进一步指出,自由主义在这里通过裁判其他民族的经历并借以干涉他们的生活以达到将帝国统治合法化的目的。^⑤ 而珍妮弗·皮茨的研究表明,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帝国主义者,她认为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边沁都反对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到了詹姆斯·密尔父子那里自由主义发生了一个转向,成为了支持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⑥ 殖民主义的“科学”话语与“文明使命”话语常常是相伴而生的,吉安·普拉卡什认为,科学文化权威在印度的形成始于 19 世纪初期引入的“文明使命”话语。^⑦ 很显然,作为一套殖民话语体系,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大卫·阿诺德的研究发现,英国殖民者贬斥印度传统医学,将印度文化与印度次大陆的自然环境同样看作病原体的来源,以此抬高西方医学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向印度人宣示“如何将高级文明传播到印度”,^⑧无疑,这种“科学”话语建构的目的是为英国统治打造道德正义性。

当然,后殖民理论虽然启发了许多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还是与纯粹的理论保持了应有的距离,也避免了后殖民理论的某些缺陷。比如,约翰·麦肯齐批评萨义德的理论带有极端的非历史倾向,同样将“西方”本质化,没有考虑到西方知识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⑨ 托马斯·特劳特曼对萨义德理论的僵化也表示不满,他说东方学不是铁板一块,也不一定与权力相关。特劳特曼梳理了 1750 年到 1900 年欧洲学者的梵语研究和雅利安种族研究,认为这些学者大体上分为“崇印派”(Indomania)和“憎印派”(Indophobia),前者包括威廉·琼斯、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后者包括詹姆斯·密尔和罗伯特·莱瑟姆(Robert Latham)等学者。^⑩ 托马斯·梅特卡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研究了

^① Gyanendra Pandey,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alism in Colonial North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Leroy Vail, ed., *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③ Ashis Nandy,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1.

^④ 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of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⑤ 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of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p. 191.

^⑥ Jennifer Pitts,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关于“文明使命”话语的研究还可参见 Catherine Hall, *Civilizing Subjects: 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Levin, Michael, *J. S. Mill o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Routledge, 2004; Carey A. Watt and Michael Mann, eds., *Civilizing Missions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outh Asia: From Improvement to Development*, Anthem Press, 2011.

^⑦ Gyan Prakash,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

^⑧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98.

^⑨ John M. Mackenzie, “Edward Said and the Historians”, *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s*, Vol. 18, No. 1, 1994, pp. 9-25.

^⑩ Thomas R.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关于雅利安人话语与东方主义的关系还可参见 Tony Ballantyne, *Orientalism and Race: Aryan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 Palgrave, 2002.

英印统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和复杂性,总结说“英国人对印度的看法从来没有呈现出一种单一而连贯的思路,相反,他们用以维持帝国在印度统治的理念与思路总是充斥着矛盾与多变”。同时他也承认,整个英印统治时期,影响统治意识形态最大的仍然是制造“差异”话语。^①

二、帝国底层的反抗意识与主体性

萨义德关注的核心议题是“表述”与话语支配的关系。在他笔下,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构成了话语霸权,东方是沉默的,自身无法表述,只能通过西方人来认识自己,他还曾明确地说,“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② 东方或者帝国底层的人民能否表述自身?他们能否拥有主体性?后殖民理论表现出多元的形态,印度的“底层研究”和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为后殖民批评提供了另一种思路。相关的研究和理论成为刺激后殖民史学发展的重要来源。

“底层研究”学派的出现源于一些印度本土的历史学家对精英主义叙事的不满。该学派的旗帜性人物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1982年出版的《底层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纲领性的文章,批评了印度史书写中的两种精英主义倾向:一种是把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现代化看作是印度精英学习西方和殖民体制的后果;另一种则视为少数英雄反抗殖民统治的伟大业绩。古哈认为,这种叙事有意忽略了“人民的政治”,即以广大劳动者构成的底层阶级和群体的思想和活动。它与精英政治平行,是一个“自主”领域,它存在于前殖民时期,在殖民时期发展成新的形态。他还指出,印度的精英和底层阶级在民族主义动员方面是截然不同的,精英的动员墨守成规,采用妥协和非暴力的手段,而底层的动员则更具有暴力性,1919年的反罗特拉运动、1924年的曹里曹拉事件、1942年“撤出印度”和1946年的印度皇家海军起义,都表现出与精英政治,特别是甘地及国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同的底层主体性。^③ 在这种“从底层发现历史”的史学理念指导下,“底层研究”学派书写了大量殖民时期印度农民、工人、士兵等底层群体的反抗史,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底层的自主性意识。^④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的“底层研究”思潮已经在西方,甚至拉美地区产生广泛的影响。^⑤

然而,正当“底层研究”在西方获得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时,该学派却转向迎合西方的后殖民思潮,受福柯、萨义德的影响越来越大,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被取代,他们把研究重点从殖民地底层人民的反抗与“自主性”转向对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⑥ 这也造成“底层研究”学派的分裂,苏米特·萨卡公开批评拥抱后殖民理论的底层研究造成“底层”的衰落甚至缺席,又回到他们曾经批判的精英主义史学。^⑦ 当底层研究与萨义德式的后殖民研究渐趋合流,不再重点关注底层人民的反抗政

^① 参见托马斯·R·梅特卡夫《新编剑桥印度史·英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李东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②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418页。

^③ 拉纳吉特·古哈:《论殖民地印度史编撰的若干问题》,载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④ 参见Ranajit Guha, ed., *Subaltern Studies*, Vols. I - V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989。代表性专著有David Hardiman, *Peasant Nationalists of Gujarat: Kheda District, 1917 - 193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Ranajit Guha,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Dipesh Chakrabarty, *Rethinking Working-Class History: Bengal 1890 to 194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⑤ 张旭鹏:《“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⑥ 张旭鹏:《“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⑦ Sumit Sarkar, “The Decline of the Subaltern in Subaltern Studies”, in Vinayak Chaturvedi, ed., *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 Verso, 2000, p. 307.

治时,另一位后殖民理论学者霍米·巴巴提出的混杂性理论再次将人们的眼光移向底层的主体性与反抗主题。^① 霍米·巴巴批评萨义德把殖民权力全部看成是殖民者的,忽略被殖民者的反抗策略,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和理论的简单化。^② 他否定萨义德论述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单向的权力关系,认为被殖民者通过“模拟”“混杂化”等策略,表面上模仿殖民者,实际上破坏了殖民权威,瓦解了殖民秩序,表现出主体的抵抗。^③ 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给一些帝国史学者带来新的灵感。

保罗·吉尔乔伊在《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一书中探讨了黑人的文化混杂和主体性议题,他提到,黑人通过奴隶贸易等形式与白人社会接触,黑人与白人文化产生了文化混杂,出现了霍米·巴巴所说的“中间状态”。因此,黑人形成了“双重意识”,他们一方面捍卫西方的价值,另一方面保持黑人的集体认同,对故乡非洲十分着迷,同时对西方文化展开激烈的批评。^④ 吉尔乔伊通过阐释黑人的主体意识,反思西方的现代性叙事,主张应该把黑人的历史、奴隶制整合到现代性叙事当中,最终颠覆在主导种族和主流话语中流行的中心—边缘关系,从而实现重构现代思想史。^⑤

印度裔女性历史学家杜尔巴·高希关注的是殖民时期印度女性与白人男性的跨文化婚姻现象。她意在回应斯皮瓦克有关“底层能说话吗”的问题,但她不同意斯皮瓦克的否定性答案。高希在殖民地档案、政府文件和家庭遗嘱等历史文献中找到大量与英国男人结为伴侣或者保持情人关系的女性,发现这些拥有跨文化背景的印度女性策略性地利用混杂身份,比如,使用欧洲人的名字,但用当地语言书写;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要求举行印度教徒或穆斯林的丧葬仪式;在她们的家庭中使用欧洲的瓷器和印度的铜器,穿戴本土和欧洲的服装等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从而塑造女性的主体性地位。^⑥

一些帝国史学者在研究殖民地的主体性问题时超出种族、女性、底层群体的范围,他们还从后殖民视角考察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深刻影响,甚至提出“去中心化帝国”的命题。^⑦ 确实,后殖民视角有助于重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重建宗主国与殖民地历史之间的联系。安·劳拉·施拖勒和弗雷德里克·库珀曾精辟地论述过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双向作用。他们指出,“欧洲的殖民地从来都不是可以按照欧洲的形象打造或者为了欧洲的利益而可以随意塑造的空白之地;欧洲的宗主国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实体……欧洲是由它的帝国事业所造就的,正如殖民地是在与欧洲的冲突中发展一样”。^⑧ 安托瓦内特·伯顿对帝国女性史的研究颇具有代表性。她在《历史的重担》一书中分析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

^① 1988年,古哈和斯皮瓦克从《底层研究》前五卷中选出代表性的若干篇文章以《底层研究选本》在西方出版,萨义德为之撰写长序,显示前期的“底层研究”与后殖民理论虽平行发展却存在认知上的亲近性。参见 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参见罗伯特·扬《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赵稀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③ 霍米·巴巴除了提出“混杂化”和“模拟”两个独创性的概念之外,还提出了“矛盾性”“第三空间”“中间状态”等一系列相近的概念。参见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1994。

^④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Verso, 1993。

^⑤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p. 45。

^⑥ Durba Ghosh, “Decoding the Nameless: Gender, Subjectivity, and Historical Methodologies in Reading the Archives of Colonial India”, in Kathleen Wilson, ed., *A New Imperial History: Culture,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 1660–18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7–316。

^⑦ Durba Ghosh and Dane Kennedy, eds., *Decentering Empire: Britain, India and the Transcolonial World*, Orient Longman, 2006。

^⑧ Ann Laura Stoler and Frederick Coop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1。

代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如何构建和利用印度女性的刻板印象来支持她们自身解放的努力。^① 伯顿的研究表明帝国本身也改变了宗主国的政治文化。无疑,重新书写帝国中心与底层或者边缘单向度的关系,转换旧帝国史书写中宗主国向殖民地传播文明的叙事范式,是后殖民史学的一大贡献。

三、后殖民理论衰落后的后殖民史学

萨义德曾告诫说,后殖民理论如果不能继续发展,就可能过早陷入“休止”状态。^② 事实是,进入21世纪,后殖民理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有影响力的作品锐减。而且,它一直遭受来自左右两种力量的批评。右翼学者指责《东方学》包含反西方的倾向。^③ 左翼学者阿吉兹·阿罕默德在20世纪末就批评后殖民理论学者所持的文化决定论和“无限文本主义”存在缺陷,并指出他们看不到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偏见本质上不是话语而是资本主义支配的后果。^④ 另一位左翼学者维克·基伯2013年出版一本集中批评“底层研究”学派的著作《后殖民理论与资本的幽灵》,指出作为后殖民研究的“底层研究”系统地误解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特别是印度的发展史,并警告,他们低估资本主义的能力不但容忍自由资产阶级的霸权,甚至助长了它。^⑤ 最根本地,后殖民研究不过是象牙塔的学问,严重脱离现实,成为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工具。尤其是,当美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新帝国主义”的讨论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时,^⑥作为批评帝国主义的后殖民理论根本无力干涉现实中西方的新帝国主义政策。因此,2007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以“后殖民理论终结了吗”为题举行一个圆桌会议,讨论后殖民理论面临的挑战。^⑦ 后殖民理论是否终结的问题仍在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20世纪后期的兴盛,近二十年来后殖民理论明显衰落了。^⑧

后殖民理论虽然已经衰落,但后殖民史学仍然保持着活力。这可以说明后殖民话语分析的方法被历史学家所接受,正像西蒙·基坎蒂(Simon Gikandi)所说的,后殖民理论的“终结”不是意味着“死亡”而是“完成”。^⑨ 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从1991年开始出版“剑桥帝国和后殖民史”丛书,据其官方网站统计,到现在已经出版108本专著,只有4本是2000年前出版的,其中包含大量运用后殖民方法研究的著作。^⑩ 最近的后殖民史学研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研究显示出长时段综合性的特征,普拉莫德·纳亚尔考察英国人从16世纪与印度人最初接触

① Antoinette Burton, *Burdens of History: British Feminists, Indian Women, and Imperial Culture, 1865 - 191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② 参见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忠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③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425页。

④ 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易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⑤ Vivek Chibber,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Verso, 2013. 基伯的批评引起“底层研究”学派的回应,参见 Rosie Warren, ed., *The Debate on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Verso, 2017.

⑥ Vivek Chibber, “The Return of Imperialism to Social Sc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No. 3, 2004, pp. 427 - 441;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⑦ Patricia Yaeger, “Editor’s Column: The En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 Roundtable with Sunil Agnani, Fernando Coronil, Gaurav Desai, Mamdou Diouf, Simon Gikandi, Susie Tharu, and Jennifer Wenzel”,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22, No. 3, 2007, pp. 633 - 651.

⑧ 巴加特-肯尼迪最近在一篇文章中也承认,后殖民理论公认地衰落了。参见 Monika Bhagat-Kennedy, “Nation After World: Rethinking ‘The En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20, No. 3, 2018, pp. 335 - 344.

⑨ Patricia Yaeger, “Editor’s Column: The En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 Roundtable with Sunil Agnani, Fernando Coronil, Gaurav Desai, Mamdou Diouf, Simon Gikandi, Susie Tharu, and Jennifer Wenzel”, p. 635.

⑩ [https://www.palgrave.com/gp/series/13937\[2020-03-01\]](https://www.palgrave.com/gp/series/13937[2020-03-01])

到20世纪早期400年的时间里观察、探索、统治印度以及殖民统治末期与印度谈判的几种话语,时间跨度更长,涉及的殖民知识范围更广,几乎运用了所有非虚构的文献资料。^①帝国在东亚的扩张成为后殖民史研究的学术热点。乌尔里克·希利曼分析英国在东亚扩张中对迫切认识中国的知识渴望,以及形成的中国知识在英中权力关系中的应用。^②陈松川关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英国商人集团在中国收集情报的情况,以及以出版英文报刊的形式与中国政府展开的舆论战,指出他们在舆论战中以发动战争相威胁客观上促成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③还有一些学者从殖民地精英的角度探讨殖民主义话语的影响,这正是萨义德所忽视的。西奥多·库迪切克探讨19世纪英国本土和帝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大不列颠的历史想象,指出英国的自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宗主国衰落却在殖民地印度获得回响,而印度知识分子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利益改写了自由主义的进步叙事。^④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对后殖民话语保持距离的旧帝国史也出现了与新帝国史合流的趋势。比如,帝国史家C. A. 贝利对后殖民史学持保留意见,却写出令后殖民史学者艳羡的著作。^⑤他的《帝国与情报》考察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东印度公司雇用间谍、记者、博学的幕僚共同组成的情报网络,还谈到殖民当局如何理解和误解情报人员提供的信息,以便更好地实施统治。毫无疑问,有关情报信息与帝国统治的讨论属于后殖民话语分析的典型话题。^⑥2012年,贝利在另一本书中同样探讨抵抗意识与主体性的关系,认为殖民时期印度受过英式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不仅抵抗殖民统治,还在思考如果成为一个全球共和国(英帝国的变体)的公民,如何获得“美好生活”的问题。^⑦

总之,历史学家将后殖民理论引入历史研究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戴恩·肯尼迪提到,经过二三十年的接触与碰撞,历史学家对后殖民理论的态度已经从原来的疏离和抵触转变为容忍甚至偏好,后殖民转向使帝国史研究成为历史学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⑧为什么后殖民史学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这是因为后殖民史学揭示了殖民主义除政治、经济和军事之外的另一种面向,即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为我们揭示西方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动力。而且,后殖民史学“发现”了农民、工人、妇女、有色种族这些底层沉默者的历史,重构了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给予边缘者以主体地位。正因为如此,后殖民学者秉持“去中心化帝国”“地方化欧洲”“把欧洲作为他者”等史学理念,^⑨致力于摒弃欧洲的殖民主义话语来实现学术的非殖民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责任编辑:吴英)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Pramod K. Nayar, *Colonial Voices: The Discourses of Empire*, Wiley-Blackwell, 2012.

^② Ulrike Hillemann,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China and the Networks of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③ Song-Chuan Chen,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④ Theodore Koditschek, *Liberalism, Imperialism,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Nineteenth-Century Visions of a Greater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⑤ 阿西娜·赛利亚图:《帝国的、民族的、殖民的、政治的:英帝国史及其流裔》,第32页。

^⑥ 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⑦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⑧ Dane Kennedy, "Postcolonialism and History", in Graham Hugg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p. 467.

^⑨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adhika Mohanram, *Imperial White: Race, Diaspor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